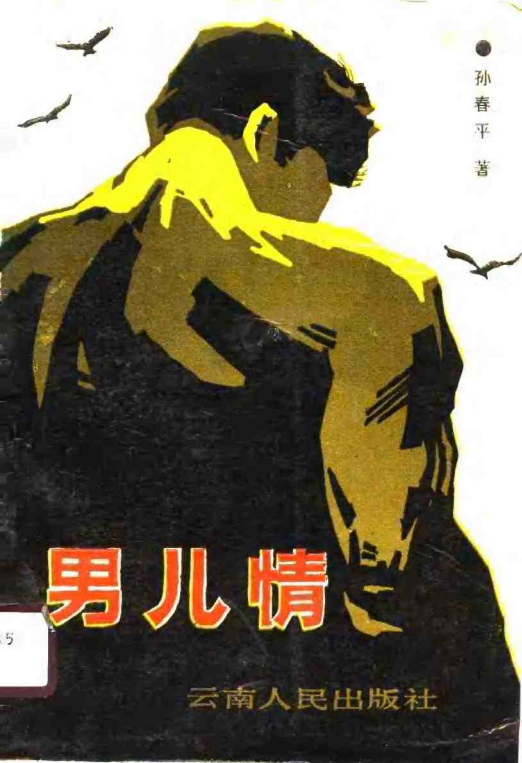




● 孙春平 著

男儿情

云南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集了青年作家孙春平近年来创作的五篇中篇小说，其中三篇是以铁路生活为背景，另两篇则写的是发生在机关和工厂里的故事，这些作品深刻地反映了人们普遍关心和思索的现实问题。作者以其凝重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写人生，写命运，写时代，故事情节起伏曲折，人物性格鲜明突出，语言风格平易幽默，多侧面多角度地折射出时代的光彩。

男 儿 情 NAN ER QING

孙春平 著

责任编辑：张 强

封面设计：张英伟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昆明市书林街一〇〇号)

9.6印张 3插图
字数：222千

锦州铁路分局印刷总厂印刷

1990年8月第一版

1990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3000册

定价：3.95元

统一书号：ISBN 7-222-00567-6/I·161



作者简介

孙春平 男 满族，一九五〇年生。现为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辽宁分会会员、锦州市文联副主席。

主要从事中短篇小说创作，现已发表百余万字作品。除短篇小说集《路劫》，另有报告文学集三部及电视剧本《远方有绿灯》（六集）、《阿C的口福》等。

《孙春平中短篇小说集》

序

李 国 文

春平为人稳健，为文也稳健。

他近几年发表在《十月》、《鸭绿江》等等刊物上的中短篇小说，真可以说是“一步一个脚印”，看得出他扎扎实实地在成熟着、进取着的轨迹。

我和春平熟识起来，为期也不算短了。那时候我们都在铁路系统，他在锦州，我在北京。后来我们相继离开了铁路调到专业文艺部门，他仍在锦州，我仍在北京。相隔不算很远，但也不算很近，但彼此联系倒未中断。虽然我们年龄相差甚多，春平正处于创作旺盛时期，是位有潜力的青年作家，但我发现我们之间，对于生活，对于文学，对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有许多共同的语言。所以也就有了一份友情，他每一篇新作问世，既作为读者，也作为朋友的我，都与他分享着创作成功的喜悦。

那几年我还主编着一份刊物，他的作品，有的选了，有的未选。但未选的作品如《吃客》，如《新华剧场六排一号》等等，其实并不比其他作家选中的作品，差到哪里，只是对朋友要求严格罢了。而且我相信，春平这样脚踏实地写下去，珠玑之作，谅不会太迟。因为他写作绝对认真，一丝不苟，每经营一篇新作，总想有所创见，有所不同，有别于以前自己写的作品。许多作家常苦于平面发展难以拔高半步，春平在这方面的自觉性，促使他追求写出特色。前人诗云：“语不惊人死不休”，其实也是在艺术世界中苦苦地寻求突破口的艰辛努力。当然，这是所有作家都会面临的难题，春平自不例外。他孜孜不息地探索，不追逐风向，不趋赶热闹，逐步走在日益成熟的创作道路上。

春平这些作品，写了实实在在的人生，色彩浓重，笔墨酣畅，倾注着一腔热情，虽是些平凡的人物，却又有不平凡的业绩，真实、深沉，耐咀嚼，有余味，这些

辐射出时代光彩的篇章，或电台播放，或电视剧、电影演出，都产生出回响。他的另一路拳法作品，都为短篇或极短篇，以幽默的笔调描绘世态人心，洞察幽微，鞭辟入里，于一笑中将丑相并落在光天化日之下，令人大快朵颐。

春平的耐得寂寞，或者还可以说是甘于寂寞，也是很让我感佩的。作家写作品，原是希望人读、看、议、评的，甚至希望更多的人读、看、议、评。但一些突然走红的作家，一些突然叫响的作品，其中也不乏“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而一些货真价实，确有几分沉甸甸份量者，例如石沉大海，了无音讯。这种人为的助长声势之举，是挺让许多作家沉不住气的。我发现春平对此倒不甚介意，你热闹你的，我冷清我的，该怎么写还是怎么写。主心骨有了，就不会象有些青年作家那样老是改弦更张——当然，变并非坏事，但轻易改变，就象狗熊掰棒子那样，结果一无所获。

他认准了，写人生，写命运，写时代，写他所熟悉、熟知的生活，而且认真建构，仔细雕琢每一篇作品，不断磨砺技巧，提高技法，广泛摄取营养，加强积累，经常到生活的激流中去感知体验。我想，这就是春平的创作潜力，正因为如此，可以预料，他将会拿出更出色的作品来满足读者。

这不是遥远的希望，而是可以拭目以待的事情，我这样坚信着。

目 录

序.....	李国文
市委大楼里有个疯婆婆.....	(1)
远方有绿灯.....	(43)
亲家.....	(127)
闪闪的电弧.....	(176)
男儿情.....	(217)
后记.....	(296)

市委大楼里有个疯婆婆

一

如果把这个不大不小的北方城市看作一个圆，那么这座铅灰色的四层大楼则正好处在圆心的位置上。它雄伟、壮观、威严、肃穆，象一位深沉的历史老人，将这个城市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一切都不声不响地看在眼里，刻在心间。人们登上那用青色花岗岩条石铺成的宽阔而坚实的通向楼门的长长梯道，嘻笑者会敛去笑容，高嗓门会屏气低声，甚至脚也会抬得高些，迈得轻些。这里的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都展示给人们一种崇高的权威力量。

啊！市委机关大楼！

可是，谁会想到，在这么个威严、肃穆的大楼里，却勤勤恳恳“工作”着一位疯老太婆。她每天提前十五分钟跨进楼门，下班铃响后才拎起饭盒回家，二十年如一日，不避寒暑，不误风雨，甚至星期天、节假日、中秋月圆、大年初一也不休息，象一个充足电、装上定时程序的机器人，极准确极自觉地往返于自家住宅小院和市委大楼之间。

她似乎勿须休息，因为她确实确实是一位中枢神经系统出了毛病的病人。

她似乎也不需要什么团聚和喜庆，她的家只剩下她孤零零孑然一身。

人们不知她姓什么，叫什么，只知道她的老伴生前曾是市委机关的门卫兼清洁工，姓于，叫于德本。于是，人们身前背后便叫她于老太婆，或干脆直呼疯婆婆的也大有人在——她已不知羞恼怨愤。

可是她的疯，又不同于那些癫癫狂狂、魔魔怔怔的神经分裂症患者。她不打，不闹，不哭，不叫，能够证明她与健康人不同的只是至今仍拖在脑后的两根由枯槁灰白的头发编成的搭肩细辫子和两只痴痴呆呆看人的眼睛。那两根细辫子是四十年代末或五十年代初年轻姑娘的流行发式，她如今仍梳理得规规矩矩，一丝不乱，辫梢上还系上一根红艳艳的毛线绳。于是，那白的辫，那红的结，那皮肉松弛的瘦瘦脸庞上纵横交错刀刻斧凿般的皱褶沟沟，那死鱼一样无光无神痴痴呆呆看人的眼睛，以及那瘦削得象虾一样躬曲的身于，都让人惊，让人怕，让人心底陡生寒气，又让人奇，让人笑，可笑又笑不出来。她那不伦不类的打扮和痴怔怔的神态，会让人联想起许许多多令人悲伤哀怜的故事。

是的，她有一个和我们共和国千千万万人相同而又独特的不堪回首的悲惨故事。那是那场大动乱的第二个年头，造反派开始“夺权”了。不识时务的她的老伴于德本堵在机关大楼门前，还想单枪匹马，尽一尽一个门卫工人的职责。造反派冲到门口，他还劝，还挡，还往外推，急先锋们急了，抡起巴掌抽他耳光。正巧，来给爸爸送饭的儿子于子杰见此情景，扑上去抡起装在网袋里的饭盒就朝打他爸爸的那家伙脸上还击。那疾如闪电的“流星锤”带着一个高中生的怒和恨，立刻砸得那造反派满脸开花。于子杰愣了一下，丢下饭盒，扭头就跑。造反派们一声喊，踏着被推翻在地的于德本的身体就冲进楼来。于子杰仗着身灵腿快道路熟，几番盘绕钻窜，甩开追击者，很快躲进地下室，又多亏爸爸的好友清洁工孟昭勤的掩护，将他藏在

储存清洁用品的一间小黑屋里，直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引他偷偷逃出了大楼。于子杰怕造反派躲在家里“蹲坑”，便直奔火车站运转场，攀上一列已经开动的货车，不管天南地北，惶惶然自逃生路去了。从此音信皆无。

没抓着儿子，造反有理的“捍卫者”们便把百倍千倍的凶狠报复在已身负重伤的老子身上，逼他交出胆敢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狗崽子。就在那天夜里最黑暗的时刻，车轴般的汉子于德本被那些人踩在脚下，惨叫一声，口喷鲜血，命归黄泉。

一夜间，儿子逃无踪迹，丈夫又惨死暴亡，尸首不见。天亮时赶到市委大楼来的于婆婆闻此噩耗，扑通倒地，白眼上翻，四肢抽搐，人事不知。慌急的人们掐人中，捶脊背，山呼海叫，总算把她唤醒过来。于婆婆痴迷迷坐起身，突然直勾勾地盯住墙角的那把大拖布，嘴里喃喃：“子杰他爹，子杰他爹……”清洁工孟昭勤见此情景，暗叫不好，急忙把拖布挂在手，强装作笑说：“于嫂子，于大哥他有事出门了，把家什交给我，让我替他干几天。你放宽心等他些日子，过些天他就带子杰回来了。”孟师傅本意是先稳稳她的心，只怕她内火太盛，血迷心窍，万没想到神志昏迷的于婆婆挣扎着扑过去，抓起拖布就擦起来……

这一擦就是二十来年啊！“坐地日行八万里”，数以千计的日出口落，周而复始的春夏秋冬，谁知在她手下扫秃了多少扫帚，拖散了多少拖把，揉碎了多少抹布！有人说她是气血归心，此生难愈；又有人说这是于德本冤魂不散，附体缠身。当年“武斗”时，日伪时期就曾是警备司令部的市委大楼又成了“工总司”的大本营，舞枪弄棒的好汉们不许这疯娘们（那时她还年轻）进这钢打铁铸的大楼，她便坐在楼前台阶上整日整日呜呜咽咽地哭嚎，嘴里不住声地叨念：“子杰呀……他爹

呀……”孟昭勤担心这疯婆婆即便哭不死，也不知何时一颗流弹飞来，要了她的性命，便向各位司令、头领们哀婉求情，说这女人虽病，却不祸害人，只知白干活，不如让她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尽一份力。正巧占据大楼和当初夺权打死于德本的是对立派，他们正想用这沉甸甸的大肥例子做做攻击对方的文章，况且那些俗体凡胎的司令们也难免一动悲悯恻隐之心，便恩准了她进楼“做贡献”。说来也怪，她只要一摸扫帚、拖把，便象注射了足量的镇静剂，安安静静只知干活，且那活计干得极其洁净细致，无可挑剔，水磨石地面擦得光可鉴人，窗棱门框容不得半点积尘污垢。后来，时局渐渐稳定，或军管会，或革委会，掌权人虽说都觉得堂堂皇皇的机关大楼里整日蹒跚这么位疯女人有伤大雅，几次想送她去神经病院或孤老院，但都受不得门卫师傅孟昭勤的极力陈词进谏。再说大楼里总缺不得清洁工，选调个学毛著积极分子怕是也难得象她那样机器人般的永无怨言尽职尽责。及至到了“拨乱反正”的年代，又有人提出“机关整顿，必须先撵走疯婆婆”。孟昭勤义愤填膺，大声疾呼以至怒骂，理直气壮的理由足以让所有赞同如此宏论的人不得不闭上嘴巴：于婆婆是为保卫共产党市委机关而壮烈牺牲的于德本烈士的遗孀，孤苦零丁，无依无靠，撵她出大楼，无异于逼她去火葬场，还讲天理吗？还讲良心吗？还有点人味吗？

不过，毕竟还是有了些限制：疯婆婆的“势力范围”只限一楼，因为一楼多是信访、总务、财务等整日忙乱而又无甚要害的部门。为了不影响市委领导及主要部门的工作，二楼以上绝对不准疯婆婆涉足。对此，疯婆婆当然不懂计较，只是“势力范围”划定的最初几日，疯婆婆提着拖布欲蹬楼梯的时候，都被孟昭勤急如星火地劝阻回来。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或

可称之为条件反射，疯婆婆便能自觉地不越雷池一步了。

风风雨雨的二十年啊，疯婆婆总算艰辛而又顽强地存活下来了！

在这个世界上，也许只有老门卫孟昭勤才真正懂得这座大楼和这里的扫帚、拖把对疯婆婆的意义，也只有他的话，疯婆婆好象才听得懂听得进，才有指令般的力量。早晨，他将饭盒递给她，她便去锅炉房蒸出一天的吃食；间休时，他说一声“你该歇歇了”，她便拄着拖把，靠坐在老门卫的那张咯吱咯吱乱响的椅子上，仰着脸怔怔地盯着墙上时钟的针一下一下地跳动；午间，吃完饭，孟昭勤指指传达室的床，她便蹑在那上面不声不响地眯上一小会，有时还会打出一阵挺安实的呼噜。可孟师傅的关照和“指令”也是有禁忌的，他无论如何不能说“你再别到这儿干活了”，说了她便哭着叨念“子杰他爹”，直到孟昭勤长长叹口气，宣布收回那句“不该说”的话。孟师傅也是六十傍边的人了，老儿子在家待业三年多，他早想自己退休让儿子接班，可他思之再三，终是不放心，终是没下定决心……

疯婆婆得活到今日，还得济于她的一条叫作“虎子”的黄色瘸腿老狗。有人说那是疯婆婆的保护神，细品味也不过份，也许于家父子真的早把对妻子对母亲的眷恋与关切都托付给这条忠诚的畜类了。当年，于德本惨遭毒手的那天清晨，仅有两岁的“小虎子”嗅了嗅楼门口的血迹，便一路跑跑停停，闻闻嗅嗅，直奔郊外而去。它冲进火葬场，焦躁地转了两个圈子，然后箭一般穿过殡仪馆，扑向焚尸炉，前爪搭着炉壁狠命地抓挠狂叫起来。火葬工哪容得这个，操起一条长长的铁钩向黄狗打去。虎子凄厉而绝望地叫了几声，便拖着一条受伤的后腿一蹦一蹦地又跑回城里。到如今，生龙活虎般的小黄狗已变成一条有气无力的老“虎子”了，油亮的皮毛也早稀稀落落、黯然无

光。可二十来年中，不管星转斗移世间发生了什么变化，每日清晨和傍晚，它都紧紧地贴在疯婆婆身旁，陪着那条后腿陪伴疯婆婆行走在通往市委大楼的街道上。有时，难免有淘气的孩子围着它追追打打，它却一声不响，就是石子棍棒落在身上，也只是夹起尾巴可怜兮兮地嗷嗷低嗥两声，身子却更紧地贴在疯婆婆的腿上。可谁要欺负到了女主人头上，它会立刻眼逼凶光，喉咙里发出低沉而愤怒的吼叫，被警告者如不赶快弃恶滚开，它便凶猛得象一条真正的老虎，龇牙舞爪地扑过去。时间长了，那条必经之路上的行人或同情或畏惧，都知这个疯老太太不该惹也不能惹。人疯狗也可能疯，而疯狗咬人是药力难医的。每日疯婆婆走进楼里，虎子便伏在楼前园林的一棵丁香树丛下，整日不跑不动、不吃不喝，眼巴巴地望着楼门，只待女主人提着饭盒走出来，它才瘸着腿迎上去，再陪主人回到那个孤寂空落的家。当然，二十来年中，大黄狗也几次大难临头，生死攸关。造反派和流氓地癞子曾巴望烺吃它的肉壮阳补肾；下乡知青也曾谋算剥下它的皮去铺农村的土炕；后来城里又三番五次掀起“灭狗”热潮，打它主意的人就更不在少数。可每次都是孟师傅救下了它，不是把它偷藏在当年曾掩护过它的小主人的地下室厨房里，就是干脆牵它到城郊的亲戚家拴养一些日子，又忿然把话骂出去：“杀虎子就是杀疯老太婆！谁要敢谋狗害命，不管明的暗的，我老头子有一腔不值钱的血给他留着！”这话的威慑力量是足以让所有想打这条狗主意的人心头颤几颤的。而每次险情一过，虎子重新回到女主人身旁的那种摇尾撒欢舔手掌的快乐劲儿，又凿实令人感动。而疯婆婆疼爱虎子的唯一方式，便是无论吃什么，都是一分两份，连份量都一样，一份送到它的而前，多则同饱，少则同饥。一个难得的忠心护主的生灵，和另一个苦度余生的老人，就是这样相依为命，

低吟着无言的生命悲歌……

疯婆婆的表情总是木木的、痴痴的，一个月中只有那么一天中的那么一小会儿，她的脸上才会露出些许含着希冀和安慰而更显凄惨的笑容。那是每月发薪那一天，孟师傅领她走进财务室，她小心翼翼地贴身衣兜里摸出一个包了又包、裹了又裹的椭圆形木质印章递给出纳员，出纳员便在表格上留下“于德本”三个模模糊糊、血一样的红字，然后交给她一个装有三十二元钱的旧信封。疯婆婆那凄惨的令人不忍睹视的一笑，便是在那一刻出现的。她将钱袋紧紧地贴在胸前，低声喃喃叨念：

“子杰他爹，我又替你领啦，替你领啦……”她笑着说着，说着笑着，一遍又一遍，泪水缓缓流淌下来，挂在那干瘪枯槁的面皮上。财务室每个新调来的人都曾在这一幕前忍不住陪洒热泪，以至痛哭失声。可事怕过三，有时就难免遇上那铁石心肠的人不耐烦地往外推她：“算了算了，去去去，快干活儿去吧。”对这样的人，如果传达室邮到了他的信，孟师傅便会故意塞进抽屉关它几天“禁闭”，也算出了出心底的恶气。对大楼里每个无端喝斥过疯婆婆的人，孟师傅都有过类似的小小报复和惩治——他也只有这么大的“权力”和脓水了。

机关大楼里的人一茬又一茬，每个新来机关的人都曾对这个疯老太婆有过惊奇，有过询问，有过叹息。可是，没有人跟她有过什么交往，甚至极少有人会主动跟她说上一两句话。她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也只是象简单机械运动似的，来了去，去了来，永远那么痴怔怔地呆望傻坐，永远那么周而复始地洒扫擦抹。如果不是后来发生了一些缘她而起的故事，怕是这篇有关她的文字，也就只好到此搁笔了。

二

这是去年春天的事情了。

准确地说，是四月三十日下午将近两点三十分的时刻。市委机关的干部们除了因公务紧迫而实在脱不开身的，每人都拿一张入场券去市委礼堂参加庆祝五一劳动节的电影招待会了。繁忙的大楼里顿时变得格外安静、空寂起来，只有疯婆婆还在偌大的门厅间一下接一下地把拖布拉过去、推过来，再拉过来，再推过去，“沙——啦，沙——啦”，声音不大，却更显孤寂、单调。

市委书记金瑞石快步从楼梯口走下来，一边走，一边从上衣口袋里摸出招待券看看正面席号，又看看背面的时间。他年轻、干练，不过四十挂零，提拔到市委来不过三四个月的时间。他总是很忙，刚才是掐着时间走出自己办公室的，他不愿放过和机关全体同志一起同庆节日的机会，尽管那部片子他在省里开会的时候早已看过。高明的领导者是不能不兼顾各方面关系的，那怕是别人看来微不足道的芥末小事。

他走过疯婆婆身边，随口说了一句：“于伯母，您也歇一会儿吧。”这是他到市委几个月以来颇让众人感到惊异的独特之处。自从听了老门卫孟师傅简单地说过这个疯婆婆的遭遇后，每次走过她身边，他总是主动跟她说句话，而且人前人后都恭恭敬敬地以“于伯母”和“您”称之。仅此一点，就极令人们敬重，可也很惹一些人猜测，甚至有人贬之为是“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的小小为官之道。据说这种说法也不乏赤胆忠心的“耳报神”不失时机地汇报了上去，金瑞石听后只是哈哈一笑，不作任何解释和说明，照样我行我素，礼下疯人。只不过疯婆婆全然不知他就是如今这座大楼这个城市最大的主宰，每次见问好，便也只是跟对所有人一样痴怔怔地呆望一

阵，直到他走上楼或步出楼门而去。

此时，就在市委书记快要跨出楼门的时候，楼梯上噤噤追下小秘书，喊：“金书记，省委电话，要找您直接说，好象还挺急。”

金书记停步回身，走了几步，不禁又看看手中的票和腕上的表，犹豫了一下，走到疯婆婆跟前，说：“于伯母，这里有张票，您也去看看电影吧。”

那张桔黄色的小纸片送到疯婆婆面前，她竟惊恐地往后退了两步，眼睛瞪得好大好大。

“这是电影票，您去看电影吧。”金书记抓过她拄着拖把的手，把票送到她手上，又说了一遍。

她更惊悸惶然了，拿着票，呆呆地不知世间发生了什么事。

隔着宽大的传达室玻璃窗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的孟师傅走出来，说：“金书记，她是病人，还看什么电影啊。”

金书记说：“今天是过劳动节，她看不懂，让她坐在那儿歇歇身子也好啊。”

老孟师傅感动了，鼻子竟有点酸。这么些年了，难得还有个这么大的领导惦着一个疯老太婆，好人啊！他接过疯婆婆手中的拖把，又指指她手上的票，说：“于嫂子，金书记说，你也过节了，跟大伙儿一块去看看电影吧。”

孟师傅那异样的神态和异常的声音竟使疯婆婆好似想起了什么，她眼睛亮了一亮，点点头，说：“过节了，看电影……”

金书记吩咐等在身边的秘书说：“孟师傅正当班，你把于伯母送到礼堂去吧。”

电影还没开演。按惯例，开演前要有几分钟领导者表示庆祝、祝贺之类的讲话；也是惯例，这种讲话时场内总是乱哄哄的，